



· 语言学论丛 ·

中国英语变体中的 语言和文化认同

潘章仙 著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Chinese Varieties of English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Chinese Varieties of English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Chinese Varieties of English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Chinese Varieties of English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省 2005 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Chinese Varieties of English

中国英语变体中的语言和文化认同

潘章仙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英语变体中的语言和文化认同/潘章仙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12

(语言学论丛)

ISBN 7-301-10261-5

I. 中… II. 潘… III. 英语—语言变体—研究—中国—英文
IV. H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2052 号

书 名: 中国英语变体中的语言和文化认同

著作责任者: 潘章仙 著

责任编辑: 黄瑞明

标准书号: ISBN 7-301-10261-5/H · 1592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bing@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4

排版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印刷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9 印张 337 千字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潘章仙 女，1965年出生，浙江武义人。英语语言文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1985年7月获浙江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文学学士。1999年获英国诺丁汉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文学硕士。2001—2004年师从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胡壮麟先生攻读博士学位。2004年6月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专业方向为应用语言学、语篇分析。1985—2004年在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工作。现为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出版专著、教材和编著等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英语的主体性空间：世界英语探索”，《外语学刊》，2004（1）；“关于中国双语教育的几点思考”，《教育研究》，2003（11）；“中国英语的研究——回顾和展望”，《外语研究》，2002（6）；“及物性分析在文体特征描写时的表现力”，《山东外语教学》2003（4）；“综合英语的教学模式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3）；“试论语言教学和文学教学的融合”，《国外外语教学》，2001（4）等。曾主持一项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NO5YY01）、浙江师范大学校级重点课程建设项目（综合英语）、浙江师范大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浙江省留学回国人员科研资助项目等。参加了多项浙江省教育厅和社科立项课题。2002年获浙江省外文协会优秀论文奖。为浙江师范大学省重点扶持学科外国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主要成员之一。研究兴趣：英语语体学、语篇分析、跨文化交际、中西文化对比等。

责任编辑：黄瑞明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工作室
TEL: 13051365823

序

1981年后,我曾为研究生开设 Varieties of English 这门课,在备课过程中,曾接触到 B. Kachru 有关英语与各文化关系的思想,特别是关于 World Englishes 的提法,颇感新鲜。与此同时,国内关于中国英语的讨论日益增多,一些学者展开针对 Chinglish 和 China English 的讨论。我本人由于教学和行政工作繁忙,没有能深入钻研这个问题,引以为憾。

事隔 20 年,我应邀参加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的一次英语教学研讨会时结识浙江师范大学的潘章仙老师。她跟我谈到她曾在英国诺丁汉大学进修,写过有关中国英语的文章,并表示有志攻读博士学位继续研究的愿望,从此我俩结下师生之缘。

章仙有较广的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专业知 识,特别是语体学和社会语言学。她也掌握一定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当然,她要从事中国英语的社会文化特征研究,这是我最感兴趣的,我没有做的事,现在有人做了。考虑到中国走向世界后,英语日益成为我国对外的主要交际工具,它也必然在使用过程中反映中国的社会文化特征,形成中国式英语,从而在交际中会产生有褒有贬的不同反应。章仙结合我国国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在理论上和应用上都有价值。

章仙学习很努力。在学习期间,有时要完成浙师大的教学任务,处理家庭琐事和孩子教育问题,但她都能妥善处理,让我非常放心。我最高兴的是她在论文中能从语言的各个层次细心地科学地分析中国英语的特征,这需要语言学的基本功和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章仙没有让我失望;我更高兴的是章仙能正确地创新地摆出自己的观点,坚持不同语体的关系的表征是连续体的关系,比 Kachru 的同心圆模式更有说服力;最后,对中国英语的评估应首先立足于交际价值,章仙的功能语言学的和社会语言学的功底使她的才华获得充分展示的机会。

如今,章仙的专著出版了。我为这位幼年 是放牛女娃的成长感到无比高兴和骄傲。

胡壮麟

2005 年五一节

北大/清华蓝旗营小区

前 言

1998年,我去英国诺丁汉大学访学。期间,John McRea教授开设的 International Englishes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该课程是这样描述教学内容和目的的:本课程主要探讨作为本族语和非本族语的英语的形成和发展,特别致力于建立描述超越文化和民族界限的共有的认知图式。研究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英语使用的情况,包括英语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使用所形成的语言变体、文化认同,语言和文化、语言和权利的关系,跨文化的语用等。该课程给我打开了一个对我来说新的研究领域。从此,我认识了 Braj. B. Kachru, David Graddol, Tom McCarthy, Alistair Pennycook, Edward Said 等在此领域的专家。拜读了他们大量的著作。每一次的阅读都给了我无尽的愉悦。

从阅读中,我认识到英语的国际化地位打破了以英国英语为中心的一体化的格局,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各具文化特色的,带有地缘政治、经济和民族特征的多种英语变体,如美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新西兰英语、印度英语、新加坡英语等。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的研究者认为,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使用造就了英语的多元化,使之拥有了多元的语言文化身份和广阔的跨文化交际的语境。因此,多元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多元的符号系统、不同的语言约定和传统文化就有可能被移植到世界各类英语变体之中。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语言变异与社会变迁息息相关。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开始关注中国英语变体研究的必要性。

回国以后,我有幸成了胡壮麟先生的学生。他对我的研究兴趣鼓励有加,悉心指导。于是便有了目前的书稿。本书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全书内容包括主体部分、附录、参考文献和索引。主体部分由八章组成。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本书的内容,作者将对每一章节作一简单的介绍。

第一章 导论

中国英语变体,广义地说,指的是被具有中国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普遍使用,带有汉语语言和文化特征,能完成语言使用目的,并被其他语言和文化背景的英语使用者接受和认同的英语变体。本书对中国英语变体的语言和文化认同研究就是对中国英语的特征研究。



、本书主要回答三个问题:(1)作为外语的中国英语变体具有哪些语言文化特征?(2)哪些因素促使中国英语变体的形成和发展?(3)在非本族语的语境下,英语变体具有哪些共性?这些共性对非本族语英语变体研究的理论构建有何贡献?

第二章 世界英语:全球语境下的语言变体研究

Baugh 和 Cable 在《英语语言的历史》(1993)一书中说:“英语在过去 1500 年的历史讲述的就是多元文化相互接触的故事。”随着英语的不断传播,它从多元文化中不断地吸取营养,展示着不同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意识形态、文化意识和文化身份便成了英语多元化研究的重要方面。人们从社会语言学和跨文化交际的视角研究英语的变体。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英语的国际化地位造就了英语的多元化,使英语拥有了多种文化身份和广阔的跨文化的交际语境。它包括本族语者相互之间、本族语和非本族语者之间、非本族语者相互之间的多维交际语境。其结果必然带来多元的符号系统、不同的语言约定和文化传统。

因此,英语成了复数的 World Englishes(世界英语)。世界诸英语变体最早引起广泛关注的时间应该是在 1978 年的 4 月和 6 月。期间,在美国伊利诺大学和夏威夷檀香山召开了以“非本族语语境下的英语”和“英语作为国际国内交流手段”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前者由美籍印度语言学家 Braj. Kachru 组织,美国伊利诺大学和美国语言学会联合举办。会上 25 位学者讨论了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英语使用情况,如加纳、印度、肯尼亚、菲律宾、斯里兰卡、台湾、西印度群岛、扎伊尔以及美国和英国。由 Kachru 主编的论文集《另一种语言:跨文化的英语》(1982)便是这次会议的结晶。后者由东西方研究中心(The East-West Centre)组织。会议的论文集《跨文化交际的英语》于 1981 年出版,主编是 Larry E. Smith。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都是讨论非英语国家使用英语时的本土化特征以及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文化移入、文化身份的意识等问题。可以说,这两次会议标志着英语多元化研究的开端。同年,成立了世界英语国际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rld Englishes),简称 IAWE。该协会的宗旨是为那些在教学和科研中涉及世界各类英语的人们建立起国际间的联系。协会关注与世界诸英语三个主要方面——语言、文学、教学相关的国际问题。IAWE 研究多元文化和社会环境下的英语变体的形式和功能。以 Kachru 为代表的美国伊利诺大学无疑是世界英语的研究中心。1992 年,IAWE 在该大学召开了第一次国际研讨会。自 1995 年以来,IAWE 每年召开国际研讨会,会议的地点遍布世界各地,以示协会所倡导的英语研究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年会讨论的范围包

括世界英语研究的方方面面,如:世界诸英语变体的语法描述;语篇策略;第二语言或外语的习得和教学;评价、测试;语码转换、混合语、借用;权利、意识形态、身份、文化认同;语言规划和政策;英语对本土语言的影响;传媒英语和广告等(参见 <http://www.linguistics.uiuc.edu./iawe>)。除了 IAWWE 以外,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陆续出版了以研究世界各类英语为主题的杂志,如《世界英语》(*English World-wide*)(在阿姆斯特丹和费城出版)、《今日英语》(*English Today*)(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在英、美由 Blackwell 出版)、《亚洲英语》(*Asian Englishes*)(在日本的东京出版)等。

对中国英语变体的讨论始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首先,1982 年葛传槩先生在《翻译通讯》上发表了《漫谈由汉译英问题》一文。在此文中葛老第一次提出了 Chinese English 和 China English 的概念。他认为,为了在翻译过程中既不丢失源语的文化,又要兼顾目的语国家阅读者的理解,许多情况下可采用直译加注释的方法。汉译英的直译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 Chinese English 或 Chinglish 之嫌。但是他指出:“不论在旧中国或新中国,讲或写英语都有些我国特有的东西需要表达。”如“四书”、“五经”、“白话文”、“人民公社”(Four Books, Five Classics, baihuawen, people's commune)等。他认为这些译文“不是 Chinese English 或 Chinglish,而是 China English”。“英语民族的人听到或谈到这些名称,一时可能不懂,但一经解释,不难懂得。”以此为据,汪榕培(1991)、李文中(1993)、谢之君(1995)、贾冠杰(1997)等纷纷撰文说明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以及存在的必要性,并试图回答中国英语是什么的问题。然而,从研究现状来看,对中国英语变体的研究不管从已发表的论文数量上,还是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还处在初级阶段。人们还只是停留在对一些概念的争论上,如中国英语、中国式英语、中介语、作为外语的变体、国别变体、干扰性变体等等。事实上,英语的不断国际化和本土化在世界各地引起了与日俱增的探讨。对世界诸英语变体和文化移入等问题的研究自 70 年代以来已成为国际语言学界的一项重要的课题(姜亚军,1995;颜治强,2002;潘章仙,2004)。英语不再为一国或一个民族所专有,而是一种中性的信息媒介。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也不再被看作仅有的两种标准语,而是英语的两种国别变体。在中国,从 19 世纪初到现在接触和使用英语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由于中西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渗透,许多汉语的词汇进入英语,成为英语的一部分。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的不断增加,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日常生活等领域表达中国特有的现象的英语词汇大量涌现。在词汇、句法及语篇等方面对英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其规模和速度都是惊人的。有人惊叹:English is everywhere in China. 也有人说,英语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私营的产业。如北京的新东方、金太阳,李阳的疯狂英语等。因此,研究一种具有中国社会和文化特征的中国英语必将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它给中国的英语教学、语言规划等方面都有启示作用。杜争鸣(1988)就曾建议在英语教学的专业提高阶段和研究领域补充一些中国人的英语原作、英语译本和英语本族语作家写的有关中国的作品以提高我们对中国英语的认识。随着我们对中国英语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英语在世界各类英语中的地位也将受到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的重视。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些香港的学者在密切关注着中国英语的发展,并在描述中国英语的历史和语言特征方面做出了喜人的成绩。其中 Kingsley Bolton 在 2003 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英语:社会语言学的历史》(*Chinese Englishes: 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富有代表性。

总而言之,英语的多元化现象引起人们对很多问题重新思考。它包括语言理论、语言习得、社会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等。

第三章 多维研究:本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

对语言变体的研究是社会语言学比较重要的内容之一,因为语言变异的产生离不开社会的土壤,也离不开作为社会的主体——语言使用者。本章首先梳理了在社会语言学研究中有争议的一些基本概念,如:语言、变体、方言、言语社团等。然后,分析了前人对语言变体研究理论和研究框架的长短之处,包括 Labov(1966,1972)对美国社会方言的研究侧重于社会层阶与语言变异之间的关系,社会地位越高,语言越规范标准;Milroy(1980,1992)用“社会网络”作为分析工具对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三个言语社团进行了“局内人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一个言语社团的成员若社会关系越紧密,与外界交往越少,其语言越趋向于本土方言;Kachru 对印度英语进行了“语境化”研究,并用一系列的语境参数作为框架对印度英语的印度特征进行了描述。这些研究都对本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然而,由于研究的背景、对象的不同,其研究的模式不能照搬。因此,依据本研究的目的,最后,本文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内构建了一个描写和阐释中国英语变体的模式——“三维语境网络”。三维指的是时间、空间和功能。在时间维度上,我们可以线性地或按时间顺序审视中国英语的发展脉络,发掘影响中国英语变体产生的社会和历史根源,描写中国英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和文化特征。在空间维度上,我们可以观察由地缘文化所引起的语言变体特征,特别是在人这个主体空间中,使用者的多元语言和文化身份以及他们对这种身份的意

识和认同都对变体产生极大的影响。在功能维度上,我们不仅可以评价中国英语变体在世界英语中的地位,它的发展趋势,同时,在不同的功能中,本土化的语言和文化特征的表现方式也不尽相同。时、空和功能的三维透视可以构成中国英语变体的立体化的概貌。语境的参与更能使描写客观、具体和生动。因为语境既制约着语言变体的形成,也影响着读者对变体的理解和阐释。同时,三个维度中影响变体产生的因素互相关联,形成一个网络。每一个因素都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

第四章 时间纬度:在社会历史语境下的中国英语变体

从时间纬度上来观察,中国英语作为一种变体有着自己的发展历史。从1637年中国接触英语开始,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皮钦语和外语。皮钦语的产生是因为在语言接触的最初阶段交际双方缺少共同语所致。英语作为外语的地位的确立有赖于外语教育制度的建立。随着英语地位和功能的变化,人们有理由预测英语将成为中国人的第二语言。中国英语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特征表现。皮钦语由于交际者身份的复杂性,兼有汉语方言(主要是粤语、闽南语、上海话、宁波话)、葡萄牙语、马来语和英语的特点。具有词汇有限、语法结构不全等语言特征。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英语语体正式、词语华丽、语法结构叠床架屋,非常复杂。此时的中国特征并不明显,但也可见汉语语言文化认同的痕迹,比如汉英夹杂的表述、译借词的使用等都是典型的中国英语的特征。解放后到改革开放(1949—1978)阶段的中国英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浓厚的政治色彩。改革开放到现阶段的中国英语呈现出最为显著的中国特征。这些特征体现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上。第五章将对这些特征进行更为详细的描述。

第五章 空间纬度:语言和文化迁移

Dustoor(1968)在《词语的世界》一书中说:“我们心中的气候总是培育着在英国或美国的土壤中不茂盛的植物,而这样的植物,正是因为它的异域风情,给花园带来了魅力。因此,所有热爱英语的人都会鼓励它们在英语这个世界花园里生长。”本章从人的主体性空间出发,阐述了中国英语中的中国特征是使用根据语境对语言成分进行选择的结果。选择的过程受使用者母语和本土文化的影响。通过迁移作用把属于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东西糅到英语之中,使之成为英语世界花园中一支奇异的花朵。中国英语的本土化特征表现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上。本章主要对词汇、语法和语篇层面进行了分析。就词汇而言,中国特征主要表现在借词、汉英混合词、汉化的转义词、仿造词、生造的词语等方面。在语法上,本文通过对小样本的中、美出版的英文报刊文章的对比发现,中国出版的英文报刊文章中存在着大量的左分

叉结构的句子,即状语词组和从句部分出现在句子的左边或开头,其比例远远高于美国出版的英文报刊文章。这种现象与汉语的句子成分的排列顺序相吻合。在语篇层面上,本文对中国化的语篇策略,如言语行为、称呼、咒语等进行了分析。

第六章 功能纬度:接触文学

Kachru (1992: 58)认为英语主要承担四种功能:工具、管理、人际交流、创造等。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英语作为外语,其主要的功能是工具。它不仅在教育领域里占据重要的位置,在政治、外交、新闻、学术、商业、体育和工业等各个领域都在发挥着前所未有的工具的作用。至于后三种功能还不存在。但是,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外资、合资企业的日常管理语言是英语。大量的有留学和国外生活背景的人员回流中国,使得英语有可能出现在日常的人际交流当中。当然,相对于中国十几亿人口来说,这些只是人数很少的群体。但是,他们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至少,现在走在大街上经常会听到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夹杂着英语的对话。这种英汉语码转换的风格甚至成了一些广播节目的时尚。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用英语进行文学创作。据 Adamson (2002)等人的统计,自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中国人的英文作品不止 40 种。富有代表性的有林语堂、张爱玲、韩素音等。80 年代后有金哈(音译)(Ha Jin)、张戎(Jung Chang)等在英美发表他们的英文作品。这些作家大都是在中国长大,在中国接受的教育,成年后去了国外,在国外发表英文作品。还有一些作家如谭恩美(Amy Tan)则是第二代的中国人,或称 ABC(American-born-Chinese)。他们的作品都在英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英语对中国人来说已经不仅仅是工具了。Kachru 把双语作家用非母语创作的作品称作“接触文学”。本章通过对中国双语作家创作的“接触文学”作品的分析,除了印证了许多在第五章中阐述过的语言特征之外,作者还发现在使用英语进行双向的交流和创作的过程中,一种本民族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身份不会被交际语文化所同化。Hall (1959)就曾经说过,学习外国的文化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本国的文化。这是一种互相消长的过程。也如 Bakhtin (1981)所说的那样,从他者(个体或文化)出发更深刻地理解自我,从边缘出发更深刻地了解中心。另外,面对两种不同语言和文化所带来的困惑和对抗,使用者往往会根据语境,权衡利弊,作出相应的选择。

第七章 对世界英语研究的反思

第七章探讨了“三维语境网络”框架在研究非本族语英语变体中的适用性问题。作者认为该框架既适用于对变体的全景式研究,也可为研究者提



供观察语言变体的不同视角,同时可为研究者提供阐释语言变体的理论依据。此外,通过比较印度英语、新加坡英语、马来西亚英语和中国英语的变体特征,作者概括了非本族语英语变体的一些共性,回答了本文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本章还对世界各类英语变体研究的理论进行了反思,对 Kachru 的“三个同轴圆”进行了修正,提出了动态的、发展中的世界各类英语变体是一个连续体的概念。

第八章 结语

通过时间、空间和功能三个维度对大量语料进行质的和量的研究后发现:具有中国语言和文化背景的英语使用者或多或少地会把母语的语言和文化认同创造性地移植到中国英语当中,使中国英语成为世界各类英语变体中的一员,并使它以其独特的中国本土特征丰富了英语的多元性。语言接触、外语教育的政策、政治气候、经济发展、语言和文化的迁移、使用者的文化认同、英语的功能等构成了影响中国英语变体形成和发展的因素。

本文最后对今后的可持续性研究作了思考。英语的多元化现象引起人们对很多问题的重新审视。它包括语言理论、语言习得和语言教学等。比如,在语言习得和教学中,如何评价本族语和文化的“干扰”?如何对待本土化的语言变体?英语教师应如何对待标准与变体之间的矛盾?世界英语的本土化倾向对语言规划和英语课程设置有何影响?

本书的付印倾注了很多人的心血。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我的导师胡壮麟先生。从确定题目到完成博士论文,从联系出版社到本书的付梓无不有导师的辛勤汗水。导师的严谨治学的精神,永远年轻的心态和不断创新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他那提携后学的舐犊之心让我永生难忘。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有在北大、清华和北师大举行的那些胡先生的弟子聚会。胡老师可谓桃李满天下,但他的博士毕业生大都在北京。每逢新的博士生入学、开题或论文答辩时,胡老师的弟子们就会聚集在一起。多时有二十多位,少时也有十来位。每一次的聚会都会使我这样的后学之人学到很多东西。这也是老师指导学生的独特方法之一。为此,我要感谢我的那些大师兄和师姐们,他们大都是各个名牌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如北京大学的高一虹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田贵森教授、彭宣维教授、程晓堂教授,清华大学的杨永林教授、刘世生教授,还有高彦梅博士等。他们总是及时地、不辞辛苦地把他们的宝贵经验和学识与我分享,使我受益匪浅。从他们的身上我学到的不仅是治学的方略,更有做人的道理。

其次,我要感谢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约翰·马克里(John McRea)教授、罗纳德·卡特(Ronald Carter)教授、迈克尔·迈卡锡(Michael McCarthy)教授

和彼德·斯托克韦尔(Peter Stockwell)博士。他们都是我在英国诺丁汉大学求学时的老师。是他们为我开启了研究语言变体的大门,并为我的研究奠定了语言学,特别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语篇分析的理论基础。

我也要感谢中山大学的黄国文教授,曾主持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刘润清教授、清华大学的方焱教授、北京大学的姜望琪教授等。他们都曾为我的博士论文提出过宝贵的修改意见。

让我永远不能忘怀的还有我在北京求学时的同窗好友张金凤。她不仅为我找到了一个免费的栖身之地,更重要的是当我在为论文愁眉不展之时,她总是能以乐观和开朗的心态使我们的博士生活充满色彩。同时要感谢的还有许许多多鼓励和支持过我的朋友和同学。这里,特别要提的是我的中学同窗,也是大学的同事,后来去美国和加拿大留学和工作多年,刚于去年回国的曾立人博士。他通读了全书,在文字上做了很多的修改和润色。

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对本书出版工作的大力支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外语编辑部张冰主任。她选题慎重,待人热情。没有她的支持,本书不可能得以顺利出版。

本书是“2005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国英语变体的语言和文化认同研究’”(NO5YY01)的成果之一,感谢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的资助。

同时感谢浙江师范大学的领导,特别是外国语学院领导和同事,感谢他们多年来对我的培养和关爱,特别是在我就读博士期间所给予的无私而宝贵的支持。感谢浙江工商大学校长胡祖光教授和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领导,他们都全力支持和关心我的研究工作,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帮助。

最后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丈夫陈林彬。在没有我在家的日子里,他承担了一切教育孩子和赡养老人的责任,从来没有怨言。没有他们的爱和支持,本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

由于语料和本人研究水平的限制,文中出现的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著 者
2005年10月
于浙江工商大学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English breaks the monolithic situation in which British English is the center, and catalyzes many varieties of English with nativized cultural, geopolitical, economic and raci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merican English, Australian English, New Zealand English, Malaysian English, Indian English and Singapore English. According to Sociolinguistics, language variation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social changes. Researchers of World Englishes believe that the wide use of English around the world inevitably brings the plural or multipl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to English in the different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ntexts. Therefore, pluralism has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 repertoire of cultural “meanings” and “values,” multiple semiotic systems, different linguistic conventions,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might be transplanted into different World Englishes. The present study of Chinese Varieties of English (CVE) is initiated by this belief.

CVE, in its broad sense, refers to English used by the speakers with Chines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It has the Chines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t can reach the aim of communication and can be accepted by English speakers with other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The study of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CVE in the present book is the study of its Chineseness or characteristics.

Mainly three questions are to be explored: (1) What are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of CVE as a foreign language? (2) What factors are influenc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VE? (3) In the non-native contexts, what are the universals of the English varieties? What contributions can these universals do to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study of non-native varieties of English?

Chapters 1 and 2 are introduction and literature review. In Chapter 3, a framework of “three-dimensional contextual network” is proposed based

on sociolinguistic theories. The three dimensions refer to TIME, SPACE and FUNCTION. In the temporal dimension, we can linearly or chronologically ob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CVE, explore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factors influencing its formation, and describe its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t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n the spatial dimension, we can observe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caused by the transfer and transcreation of the local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nto English. Since speakers are subjects in this particular space, their multiple cultural identities and awareness of these identities will surely influence the formation of the variety. In the functional dimension, we can not only evaluate the status of CVE in World Englishes and its future, but also observe its Chineseness since different kinds of nativization or deviations will be revealed in different functions. The three-dimensional observation will build up the whole mansion of CVE. Furthermore, context is manipulat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varieties, and influencing readers'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viations. Besides, the contributing factors in the three dimensions are interrelated to make up a network.

Chapters 4, 5 and 6 analyze and explore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of CVE respectively from the temporal, spatial and functional dimensions, to answer the first and second research questions. After exploring a large amount of data, the author has found the following points:

(1) English speakers with the Chines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will more or less transfer or transcreate the Chines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to English to make CVE one of the World Englishes. It echoes pluralism of English and enriches the "multiple identities" of English.

(2) CVE has its own history of development. It has experienced two stages since 1637 when the Chinese had first contact with English: pidgin and foreign language. Pidgin came into being because of the lack of a lingua franca at the beginning of language contact. The status of a foreign language owe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al system. English in China hopefully will develop into a second language because of the changing of its status and functions.

(3)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see different presentations of the Chi-

nes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Chinese Pidgin Englis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duced grammar and vocabulary influenced by many languages: Chinese, Portuguese, Malay and English.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Era, CVE has a formal style, long sentences, complicated structures, and big words. Although not much Chineseness has been found in this period, there are still some typical Chinese features such as the hybrid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oans, and calques. During the period of 1949—1978, the most obvious Chineseness is the heavy political color and abundant politically loaded vocabulary. Since 1978, CVE has developed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4) The Chinese identities in CVE are revealed at different linguistic levels. The author has mainly explored the levels of lexis, grammar and discourse at the present book. At the level of lexis, there are lexical borrowings, hybrid or mixed formation, semantic shift with nativized meaning and connotation, coined or created words and expressions. At the level of grammar, there are some nativized structures transferred from Chinese, which are typically preferred. At the level of discourse, the Chineseness is revealed in the nativized discourse strategies in speech acts, address terms, curses and the like.

(5) In the process of use, when speakers are faced with the possible confusion and conflict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they will try to adjust themselves to the context and ma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6) Language contact,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political clim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transfer, the speaker's cultural identity and solidarity, and English functions can all influenc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varieties.

In Chapter 7, applicability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contextual network in the study of non-native varieties of English is discussed. It is argued that this framework is not only applicable in the panoramic study of non-native varieties, but also beneficial to those who want to study the varieties from a single dimension or perspective. Besides, the author generalizes some universals of non-native varieties of English after making a comparison between Indian English, Singapore English, Malaysian English, and CVE.